

# 婚姻、杂居与移民： 明治时代日本知识界的人种论

宋晓煜

(上海社会科学院 世界中国学研究所, 上海 200235)

【摘要】明治时代,日本人与外国人的交集日益增多,跨国婚姻、内地杂居、对外移民都成为热点议题,而人种论是其中不可被忽略的元素。日本人与中国人在人种上的同质性/异质性也成为日本知识界讨论三项议题时的焦点之一。围绕跨国婚姻,支持者或是期待“黄白杂婚”带来的人种改良效果,或是期待日本人在杂居和移民过程中对混血儿的同化,相比偏重父系血统的跨国婚姻法令及法律,某种意义上更具“男女平等”的色彩。围绕内地杂居,知识界关心的是日本人种如何才能优胜劣汰的竞争中存活下去。围绕对外移民,他们更在意人种特征能助力日本“多余”人口移民至何处,其中包含着侵略扩张的野心。

【关键词】人种 跨国婚姻 内地杂居 对外移民 混血儿

日本进入明治时代(1868—1912年)以来,知识界对于日本人与外国人的交集日益关注。一方面要斟酌是否在国内与外国人杂居,另一方面开始讨论向国外大量移民。无论是向内容纳外国人,还是向外输送日本人,都面临异人种交流乃至跨国婚姻、混血儿等问题。与此同时,进化论、人类学、优生学等西方学说的传入成为重要刺激因素。于是,随着国际人口流动愈发频繁,人种论与跨国婚姻、内地杂居、对外移民相互交错,贯穿于明治时代当中。

围绕内地杂居这一议题,日本知识界各抒己见,在明治时代产出了包括专著、杂志文章、报刊时评等

在内的四百余部相关文献。<sup>①</sup>其中,主张“杂居尚早”的哲学家井上哲次郎与支持内地杂居的经济学家、历史学家田口卯吉之间的论争受到小熊英二、盐出浩之等学者的关注。<sup>②</sup>关于明治时代的对外移民,国内外学者大多按照日本人的移居目的地分门别类,聚焦日本人移居夏威夷、美国本土、加拿大、东南亚、拉丁美洲等地的历史,在移民史的框架内谈及种族歧视给日本移民带来的影响,日本本土对北海道等新开拓领地,以及殖民地的移民/殖民也成为人种视角下的研究对象。<sup>③</sup>鉴于篇幅有限,本文未将新开拓领地、殖民地等问题纳入研究对象。在近代跨国婚姻领域,长志

[作者简介] 宋晓煜,文学博士,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中国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 本文系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青年课题“近代日本的种族身份建构与国家认同研究”(项目批准号:2021ELS003)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① 鹤浦裕:《「進化論と内地雜居論」:進化論受容の一側面》,《北里大学教養部紀要》1988年3月,第84页。相关资料可参见稻生典太郎编:《内地雜居論資料集成》(全6卷),東京:原書房,1992年。

② 参见小熊英二著,文婧译:《单一民族神话的起源:日本人自画像的系谱》,北京:三联书店,2020年,第30~45页;塩出浩之:《越境者の政治史:アジア太平洋における日本人の移民と植民》,名古屋: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15年,第66~110页。

③ 可参见 Roger Daniels, *The Politics of Prejudice: The Anti-Japanese Movement in California and the Struggle for Japanese Exclusion* (New York: Atheneum, 1974); Eiichiro Azuma, *Between Two Empires: Race, History, and Transnationalism in Japanese Americ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祝曙光:《近代拉美航线上的日本移民船与移民输送》,《社会科学战线》2018年第9期;日本移民学会编:《日本と海外移住——移民の歴史・現状・展望》,東京:明石書店,2018年;木村健二:《近代日本の移民と国家・地域社会》,東京:御茶の水書房,2021年;竹沢泰子:《アメリカの人種主義:カテゴリー/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の形成と転換》,名古屋: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23年。

珠绘更关注大正、昭和时代日本本土人民与殖民地人民之间的通婚及随之而来的人种论,对明治时代的相关言论着墨不多。<sup>①</sup> 嘉本伊都子则着眼于国民国家形成过程中近代日本人与外国人之间的关系及身份界定,她把进入日本的外国人流比作“朝内的向量”,把离开日本的日本人流比作“朝外的向量”,并指出,当两个向量受到的限制减少乃至消失时,“跨国婚姻”得到实践。<sup>②</sup> 此外,关于以跨国婚姻为手段的“人种改良论”,铃木善次、孙江等学者往往聚焦记者高桥义雄与政治学家、教育家加藤弘之的论争,优生学的传播史等领域。<sup>③</sup>

那么,在跨国婚姻相关法令及法律的制定与演变过程中,以跨国婚姻为手段的“人种改良论”是否具有足够的施展空间? 跨国婚姻及混血儿在内地杂居与对外移民等议题中受到怎样的关注? 除此以外,对于内地杂居和对外移民等议题,日本知识界还从人种论的角度提出何种主张? 既有研究往往从人类学、战争史、外交史、黄祸论等视角探讨明治时代的人种论。<sup>④</sup> 抑或如上文所述,单一地聚焦跨国婚姻、内地杂居、对外移民中的某项议题,未能将三者综合起来考察人种论。然而,对日本这个国家而言,内地杂居的关键问题在于日本自身的利益是否会受到侵害,对外移民的关键问题在于日本在海外的利益能否得到扩张。换言之,前者意味着日本人在日本内地面对“外来者”,后者意味着日本人在海外成为“外来者”。站在日本国家利益立场上的近代日本知识分子,在几乎同时期面对两大议题以及随之而来的跨国婚姻议题时,其焦点分别指向何处? 本文所要讨论的是,在朝内、朝外两种向量的受限情况得到缓和的过程中,明治时代日本知识界围绕跨国婚姻、内地杂居、对外移民产生的以人种论为依据的观念分歧。

## 一、跨国婚姻与人种论

### 1. 以跨国婚姻为手段的“人种改良论”

1903年,小说家、翻译家森鸥外在《人种哲学梗概》中创造了“混血”这一译词,用以表示异人种之间血脉混合的含义,“混血儿”一词随后派生,而在此之前,日语中已有“间子”“间儿”“杂种”等词汇用于表示异人种之间诞生的子女,包括“混血儿”在内的上述词汇有时暗含着否定性意味。<sup>⑤</sup> 需要指出的是,在明治时代,“人种”一词本身就存在混淆性,可以基于肤色、颅骨、语言、区域、国境、民族、文化等进行划分,既具有生物学层面的可视性,又具有区域国别、民族层面的社会性。如坂野徹所言,在自然人类学与文化人类学(民族学)尚未分化时,也即日本人类学的草创期,“人种”还包括以文化、语言为指标的分类。<sup>⑥</sup> 也正因此,“混血儿”一词的概念同样比较模糊,在学界未有定论。

1884年9月,《时事新报》社青年记者高桥义雄出版著作《日本人种改良论》,在知识界掀起轩然大波。高桥从进化论的角度出发,强调竞争的残酷性,然后指出,随着日本国内交通日渐便利,日本国内人民迟早会与西方人直接接触并“杂居”,然而若以日本人“羸弱之身心与西洋人周旋”,则相当艰难,故而主张“人种改良”。<sup>⑦</sup> 具体方案包括加强体育锻炼、改变生活习惯、推迟结婚年龄等。其中,引发最大争议的一项方案是提议日本人与“欧美优等人种”“杂婚”,以产下经过改良的“杂种”,即混血儿。该方案也被称为“黄白杂婚论”。

对此,孙江指出,有证据表明高桥义雄的老师福泽谕吉持相同见解,例如他在文章《日本妇人论》里赞成以“内外杂婚”的方式改良人种。<sup>⑧</sup> 福泽谕吉认为,

① 参见長志珠绘:《近代日本の人種・人種化論と「国際結婚」言説の変容》,《人文学報》第114号,2019年12月。

② 嘉本伊都子:《国際結婚の誕生:〈文明国日本〉への道》,東京:新曜社,2001年,第13~14、25页。

③ 参见鈴木善次:《日本の優生学——その思想と運動の軌跡》,東京:三共出版株式会社,1983年,第11~44页。孙江:《人种——西方人种概念的建构、传布与解构》,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72~75页。

④ 可参见富山一郎:《国民の誕生と「日本人種」》,《思想》1994年11月第845号;许赛锋:《“黄祸论”与日俄战争期间的日本外交——以人种意识为视点》,《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4期;李凯航:《森鸥外与明治日本的“黄祸论”》,《历史教学问题》2020年第6期。

⑤ 参见岡村兵衛:《「混血」をめぐる言説:近代日本語辞書に現れるその同意語を中心に》,《国際文化学》第26号,2013年3月,第26~33页。

⑥ 坂野徹:《科学研究と人種概念——人種・民族・人種主義》,坂野徹、竹沢泰子編:《人種神話を解体する2 科学と社会の知》,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2016年,第7页。

⑦ 高橋義雄:《日本人種改良論》,東京:石川半次郎,1884年,第12~20页。

⑧ 孙江:《人种——西方人种概念的建构、传布与解构》,第72~73页。

“杂婚”是从外部引入“异种男女”,此乃“借助他者力量的改良法”,是“一国百年之计”,同时不能忽视“借助自身力量的改良法”,即改善国内男女体质、提高女性地位、增进女性的文化水平和精神上的快乐等。<sup>①</sup>对比福泽与高桥的观点,可知两者都以优生学为依据赞同跨国婚姻,他们并不拘泥于参与跨国婚姻的日本人是男性还是女性,只要日本男女愿意“杂婚”,就能推动日本人种的改良。另一方面,福泽谕吉将跨国婚姻视为比较缓慢的人种改良方式,是“一国百年之计”,高桥义雄则视之为捷径。他指出,加强体育锻炼、提高生活水平、增加营养摄取等手段固然重要,但是日本人经历成百上千年的身心习养才达到今天的程度,若要继续采取此类手段进行改良,又需耗费漫长的岁月,因此,日本人民应与“西洋人种”速速缔结良缘。<sup>②</sup>

政治家井上馨一向赏识高桥义雄,他大约在1889年末、1890年初首次与高桥会面,1890年3月就打算为其做媒。<sup>③</sup>据亚洲主义的倡导者头山满回忆,井上馨曾主张“人种改良论”,认为日本女性若与欧美男性结婚,则可产下优秀的后代。头山满揶揄道,那就把你的妻子和女儿嫁给“毛唐人”(对外国人的蔑称)如何?井上馨表示反对,自此不再鼓吹“人种改良论”。<sup>④</sup>由此可以窥知井上馨所谓“人种改良论”的矛盾性,他一方面希望日本国民通过跨国婚姻实现后代的人种改良,另一方面又想保持自身家族血统的纯粹性。

加藤弘之是明治时代主张进化论思想的代表性学者,他注意到高桥义雄的“人种改良论”,在《人种改良之辨》(1886年)中断言,日本人种劣于西洋人种是人尽皆知、不足为怪的事实,然而改良人种的手段有待商榷。<sup>⑤</sup>即使日本无法保持独立并实现文明进步,他也坚决反对经由“杂婚”产下“杂种”之策,因为该措施并非“人种改良”,而是“人种变更”。<sup>⑥</sup>七年之

后的1893年,明治维新取得的成就增强了加藤的人种自信心,在他看来,日本人是“优等人种”,与东南亚的“未开化人民”不可同日而语,“万一”日本人种真的劣等、无论如何都比不上“白哲人种”,那他宁愿日本人种无法走向文明,就算灭亡也未为不可。他表示:“我并非绝对反对与欧美人杂婚,倘若男女情投意合,绝不能视杂婚为错误,我只厌恶杂婚论者以把人种变为优等为目的劝导杂婚。”<sup>⑦</sup>从中可以管窥他对个人婚姻自由的尊重,反对从国家和人种视角人为推动日本人种参与跨国婚姻。

高桥义雄的“人种改良论”诞生于井上馨推进“鹿鸣馆外交”,欧化主义全面盛行的时期。铃木善次将高桥义雄的言论视为欧化思想影响下的人种改良论,并从加藤弘之的反驳中看到了民族主义的身影。<sup>⑧</sup>不过,铃木善次只是简短提及高桥曾回应过加藤的驳斥,却未展开相关分析。1886年1月19日,高桥义雄在《时事新报》上发表文章回应加藤弘之道,“人种改良”是通往“变更”的步骤,因为是往好的方向“改变”,所以是“改良”,加藤的质疑只是纠结于措辞而已。值得注意的是,高桥明确表示,“杂婚”既可以是日本男性与西洋女性结婚,也可以是日本女性与西洋男性结婚,无论产下的“杂种”是与其他“杂种”结婚还是与“纯粹的人种”结婚,“都是将人种的血脉分散到广阔的区域,在改良人种的同时使人种血脉得到永传”,如此一来,“日本人的血脉不再局限于日本国内,而是传播到外国”。<sup>⑨</sup>换言之,高桥不在乎血统的纯粹性,而是在乎血脉的传播性。他同等尊重父系和母系血统,将跨国婚姻视为改良日本人种、长久延续和广泛传播日本人种血脉的方式。

真嶋亚有指出,日本为了作为日本继续存活下去,就必须否定日本之为日本,然而人种差异是日本人“西化”过程中无论如何也无法逾越的障碍。<sup>⑩</sup>可

① 福泽谕吉:《日本婦人論》(1885年),慶應義塾編:《福澤諭吉全集》第5卷,東京:岩波書店,1959年,第447~448页。

② 高橋義雄:《日本人種改良論》,第103~105页。

③ 中川清:《文人実業家高橋義雄の生涯》,《白鷗法學》第6号,1996年10月,第211~212页。

④ 鈴木善一:《興亞運動と頭山満翁》,東京:照文閣,1942年,第148页。

⑤ 加藤弘之:《人種改良ノ辨》,《東洋学芸雜誌》第53号,1886年2月25日,第385页。

⑥ 加藤弘之:《人種改良ノ辨》,《東洋学芸雜誌》第54号,1886年3月25日,第423页。

⑦ 加藤弘之:《雜居尚早》,東京:哲学書院,1893年,第37、40、48~79页。

⑧ 鈴木善次:《日本の優生学——その思想と運動の軌跡》,第34、38页。

⑨ 高橋義雄:《加藤弘之君日本人種改良論の辨と辨ず》,《時事新報》第1176号,1886年1月19日。

⑩ 真嶋亚有著,宋晓煜译:《“肤色”的忧郁:近代日本的人种体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第17、370页。

是,高桥义雄的“人种改良论”却提出了一种“改良”人种,甚至可以说是“改变”人种的方式。并且,高桥以美国俄亥俄州处罚白人与“黑人及非洲种”通婚的法律为例,反对日本人种与“劣等人种”通婚。<sup>①</sup>换言之,面对“欧美优等人种”,他抱有强烈的自卑感;面对其他落后于日本的国家、地区,他又抱有高人一等之感。他赞成异人种之间通婚,但这是以日本人种与更优等人种通婚为前提,其“人种改良论”可谓是以优生学为依据的人种层面的“脱亚论”。至于他眼中的“欧美优等人种”是否愿意与日本人种通婚,则被其有意无意地忽略。

## 2. 跨国婚姻相关法令及法律的嬗变

16、17世纪,西方人因随地吐痰、在室内不脱鞋、喜食猪牛肉等日本人不常吃的肉类,给日本人以粗俗无礼的印象。<sup>②</sup>“南蛮人”(多指葡萄牙人、西班牙人)、“红毛人”(多指荷兰人)等具有蔑视意味的称呼反映了当时日本人对西方人的反感。在此背景下,德川幕府为了禁止基督教在日本的传播,维护幕府的统治地位,不断收紧对外政策,颁布“宽永锁国令”(1633—1639年)。1636年和1639年,“南蛮人”“红毛人”与日本人之间的混血儿分别被放逐至澳门和巴达维亚(雅加达)。日本锁国后,中国人、荷兰人被限制在有限的区域内活动。日本政府允许他们与日本的“游女”(妓女)产生交集,但是不能结婚,若是诞下子女,这些子女会被当作日本人抚养,并且和日本人一样受到“海禁”的限制。<sup>③</sup>日本开国后,在外国人居留地存续时期,日本政府禁止日本女性与外国男性结婚,却允许“游女”成为外国人的“佣妾”,又称“罗纱缅甸”。对于非正式婚姻下诞生的混血儿,其身份归属应随父亲还是母亲,日本政府曾几度变更方针,还引发过外方的质疑。

1873年3月,日本首次颁布跨国婚姻相关法令——明治六年太政官布告第103号,俗称《内外人

民婚姻条规》,日本人与外国人的婚姻自此得到法理上的认可。《内外人民婚姻条规》沿用了法学家箕作麟祥在译著《法兰西法律书》中的译词“分限”,用以描述日本人的身份。<sup>④</sup>根据该法令,日本人与外国人之间的“婚嫁”应获得日本政府的允许;日本女性若嫁给外国人,就会失去日本人的“分限”,如有充足的理由,则有望恢复日本人的“分限”;外国女性若嫁给日本人,就会获得日本人的“分限”。<sup>⑤</sup>该法令的制定主要受到法国民法典的影响,秉持以男性为中心的“夫妻同一国籍主义”。与此同时,又具有独特的日本色彩,允许外国男性以“婿养子”的身份与日本女性结婚并获得日本人的“分限”。此种“过渡性的处方”立足于日本家庭制度的延长线上,招致同时期国际社会的强烈批判。<sup>⑥</sup>《内外人民婚姻条规》并未规定跨国婚姻下混血儿的身份归属,或许是因为当夫妻被要求同属一国之时,混血儿的身份归属与父母相同也在情理之中。

在明治时代,确实有日本男性出于“人种改良”的目的与欧洲女性结婚,官僚、实业家南贞助就是一例。南贞助是倒幕志士高杉晋作的表弟,立志拥有“日英混种子孙”,留学英国期间与英国女性伊丽莎·皮特曼(Eliza Pittman)在伦敦结婚,并于1873年取得日本政府的许可。<sup>⑦</sup>此外,该时期,尾崎三良和青木周藏分别在留学、驻外期间与英国、德国女性相识并结婚。南贞助、尾崎三良、青木周藏皆为明治时代的精英,从这点来看,尽管《内外人民婚姻条规》的制定最初是为了解决外国人在日本的跨国婚姻问题,却也为日本人,特别是日本精英在海外的跨国婚姻提供了法理上的支持。

1890年,日本颁布民法典(史称“旧民法”),其中,“人事编”第二章的标题为“国民分限”,继续沿用“分限”一词对日本国民的身份予以界定。该法律规

① 高桥义雄:《日本人種改良論》,第114~115页。

② 坂西友秀:《鎖国前後における日本人の西洋人観・黒人観の心理—歴史的背景》,《埼玉大学紀要 教育学部(教育科学)》51(2),2002年,第94页。

③④ 嘉本伊都子:《國際結婚の誕生:(文明国日本)への道》,第36~40,76页。

⑤ 内閣官報局:《明治六年 法令全書》,東京:長尾景弼,1889年,第132页。

⑥ 長志珠絵:《近代日本の法的婚姻と人種論—「國際結婚」をめぐる言説空間の変容》,竹沢泰子編:《人種主義と反人種主義—越境と転換》,京都:京都大学学術出版会,2022年,第204页。

⑦ 小山勝:《明治前期國際結婚の研究:国籍事項を中心に》,《近代日本研究》第11卷,1994年,第135页。关于南贞助的相关资料,参见南贞助:《南貞助略歴》,1881年,第2页。该资料为手稿,载于《伊藤博文関係文書(その1)書類の部》,由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宪政资料室收藏。

定:在外国出生的日本人子女为“日本人”;子女“分限”随父亲“分限”;与日本人结婚的外国女性获得日本人的“分限”;同时还允许出生在日本的外国人子女,以及父亲为外国人、母亲为日本人的子女选择日本人的“分限”,外国人可通过归化获得日本人的“分限”。<sup>①</sup>由此可知,“旧民法”原则上采取“父系血统主义”和“夫妻同一国籍主义”。据远藤正敬考察,“旧民法人事编”起草人之一熊野敏三认为国民的性格主要来自人种而非土地,故而在定义“国民”时非常重视血统。<sup>②</sup>熊野敏三曾在日本司法省明法寮接受法国式的法学教育,其后因成绩优秀,于1875年至1883年被选派到法国巴黎大学留学,最终取得法学博士学位回国。从熊野敏三的求学经历来看,他不可能不受到法国法学派的影响,尽管“旧民法人事编”的起草工作特意将“旧民法”的主要起草人——法国法学家博瓦索纳德(Gustave Boissonade)排除在外。

虽然“旧民法”因引发诸多争议未能得到实施,但是,其中关于混血儿身份的许多条例在1899年的国籍法(史称“旧国籍法”)中得到继承。1899年3月15日,日本颁布首部国籍法。显然,该法律是在为同年7月《日英通商航海条约》正式生效、内地杂居即将开启做准备。“旧国籍法”同样原则上秉持“父系血统主义”和“夫妻同一国籍主义”,认定子女出生时父亲为日本人,则子女亦为日本人;通过成为日本人的妻子、“入夫”、“养子”,被日本父亲或母亲承认有血缘关系,以及“归化”等渠道可以取得日本国籍。<sup>③</sup>

随着东西交流日益频繁,日本逐步发展为近代国民国家,制定跨国婚姻相关法令及法律是时势所必须。相较而言,美国的《反异族通婚法》最早可追溯至1661年的马里兰,此后以州法的形式逐渐推广、增加对异人种通婚的限制,例如,1880年,《加州民法典》禁止给白人与黑人、黑白混血人以及蒙古人种颁发结婚证书。<sup>④</sup>日本人在加利福尼亚州被视为“蒙古人

种”,同样受到该法律的制约。也就是说,在进化论、人类学、优生学等西方学说大肆传入的明治时代,日本就算制定反对异人种通婚的法令、法律也符合该时代的风潮。然而,从《内外人民婚姻条规》、“旧民法人事编”、“旧国籍法”可以看出,跨国婚姻乃至混血儿的相关法令及法律没有明文提及“人种”,而是着眼于“日本人”这一身份。同时,外国人的归化得到了日本法令、法律的认可。

《内外人民婚姻条规》的制定最初是为了应对英国领事的咨询,以解决英国男性与日本女性的结婚问题;<sup>⑤</sup>“旧民法人事编”乃至整个“旧民法”都受到法国法学派的强烈影响;“旧国籍法”的制定则是为内地杂居做准备,而内地杂居是西方国家放弃不平等条约时获得的交换条件。从日本颁布上述法令、法律的时代背景来看,日本不可能对“人种”设限,否则会被解读为对西方人种的歧视和挑衅。然而,从熊野敏三起草“旧民法人事编”的心境可以窥知,日本的跨国婚姻相关法令及法律秉持“父系血统主义”,其底色既有对父权制的偏重,也有对日本本土人种的坚持。

由于欧美男性入赘日本女性的情况为极少数,明治时代的日本若要通过跨国婚姻来实现“人种改良”,那就需要大量日本男性与欧美女性结婚,才能大量生育出“被改良”的法理上的“日本人”。但是,据小山腾推算,自1873年至1897年,日本政府大约批准了265例跨国婚姻。<sup>⑥</sup>再者,1871年,《中日修好条规》签署,在日本的中国人显著增多,例如,1876年,日本境内外国人共计4348人,包括2371名中国人;1910年,日本境内外国人共计14897人,包括8420名中国人。<sup>⑦</sup>换言之,在明治时代,中国人往往占据日本境内外国人一半以上的比例。从法理和现实层面来看,该时期若要通过跨国婚姻大量生育出高桥义雄所谓的被“欧美优等人种”改良的“日本人”,其几率相当微小。

① 参见《民法·人事编》(1890年10月6日),《官報》第2183号,1890年10月7日,第32~33页。

② 远藤正敬:《戸籍と国籍の近现代史:民族・血统・日本人》,東京:明石書店,2013年,第88页。

③ 参见《国籍法·御署名原本·明治三十二年·法律第六十六号》,https://www.digital.archives.go.jp/DAS/meta/Detail\_F000000000000017794,访问时间:2024年5月1日。

④ 参见虹虹:《美国移民跨种族婚姻的历史和现状研究——从泰格·伍兹的种族说起》,《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08年第3期,第55~58页。

⑤ 参见櫻田嘉章:《明治6年大政官布告第103号について(その一)》,《甲南法務研究》第12卷,2016年3月,第14页。

⑥ 小山腾:《明治前期国際結婚の研究:国籍事項を中心に》,第135页。

⑦ 参见法務省入国管理局編集:《出入国管理とその実態(昭和39年)》,東京:大蔵省印刷局,1964年,第7、10页。

## 二、内地杂居与人种论

1886年5月1日起,时任日本外务大臣井上馨与外务次官青木周藏召集各国代表举办一系列的“条约改正会议”。同年6月15日,英德两国驻日公使提出,以向外国人开放内地为交换条件废除领事裁判权,英德草案第一条写道,“帝国日本政府在本条约批准后两年内向外国人开放全国”,“给予外国人与本国人同等地位”。<sup>①</sup>以“条约改正会议”为契机,内地杂居成为当时日本知识界普遍关注的议题之一。日本知识界对内地杂居或欢迎,或反对,理由涉及民族独立、经济利益、人种差异等。此外,一些知识分子虽未将人种差异作为其主张“杂居尚早”的理由,但是不可避免地在论述中反复提及“人种”,由此可以窥知明治时代知识分子对人种的强烈关注。<sup>②</sup>这里主要聚焦日本知识界围绕内地杂居产生的基于人种因素的观念分歧,大致而言,存在如下几类观点。

第一,基于人种自卑感而欢迎内地杂居,期待与“优等人种”通婚以实现人种改良。欧化主义影响下的高桥义雄无疑将目光投注到西方国家,寄希望于欧美血统带来的人种改良效果,故而对来自西方的移民颇为欢迎。在高桥义雄看来,日本人与朝鲜人、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曾通婚,三者属于同一人种,而同一人种之间的通婚未给日本人种带来明显的变化。<sup>③</sup>出于实用主义的角度,他对来自朝鲜、中国的移民没有表现出多少关注。

第二,基于人种自卑感而主张杂居尚早,担心被“优等人种”打败或同化。哲学家井上哲次郎对来自西方的移民持警戒态度。他在《内地杂居论》(1889年)中评价道,日本虽然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那是政府之功而非人民之功,日本人种与其他“劣等人种”只

是在开化程度、人口、风俗、宗教等方面有所差异,然而与“欧洲人”相比就是“劣等人种”,当“优等人种”与“劣等人种”杂居时,“劣等人种”就有可能面临人口减少、最终被“优等人种”打败的结局。<sup>④</sup>也正基于“优劣人种不宜杂居”的逻辑,井上哲次郎表示,历史上中国、朝鲜人种的血液都可混入日本人种的血脉当中,然而一旦雅利安人种进入日本内地,日本人种皆会死亡。<sup>⑤</sup>并且,井上哲次郎对于当时的欧化主义抱有强烈的警惕。他强调,如果允许内地杂居,日本人很可能被“优等的欧美人”同化。<sup>⑥</sup>井上哲次郎意识到“条约改正”与“内地开放”之间的互换关系,他宁愿延期十到二十年修改条约,借此谋得“改良国家”的时间,也不愿意立刻实行内地杂居。<sup>⑦</sup>

第三,基于人种的同质性对中国人种抱有警惕心理,认为杂居尚早。从上述高桥义雄和井上哲次郎的言论来看,两者都以日本人与中国人、朝鲜人的通婚历史为依据,将中国人、朝鲜人连带性地视为劣于西方人的人种。与井上哲次郎警惕西方相比,加藤弘之更警惕邻近的中国。加藤指出,中国人虽非西方人那样的“开化人民”,但是中国人在商业上的才能和经验凌驾于西方人,并且中国的人种、风俗习惯、生活样式等均与日本类似,一旦获得进入日本内地的便利,必将“蹂躏”日本商业社会,其危害远超西方人。<sup>⑧</sup>加藤之所以如此担心中国移民的危害,是因为他关注到19世纪后半期美国等地兴起的排华运动,其主张包含着贸易保护主义的色彩。

第四,基于日本人种混合起源论,欢迎内地杂居,期待同化带来的国家利益。不仅加藤弘之预估大量中国人将涌入日本,还有不少日本精英对此有所预判,田口卯吉就是一例。如小熊英二所言,田口卯吉虽然贬斥中国人“不知廉耻为何物”,却基于经济自由

① 外務省調査局監修、日本學術振興會編:《條約改正關係日本外交文書會議錄上》,東京:日本外交文書頒布會,1956年,第451頁。

② 可參見過辻之編:《內地雜居尚早意見》,東京:內地雜居講究會,1893年,第8~9、17、22~23頁。

③ 高橋義雄:《日本人種改良論》,第100頁。

④ 井上哲次郎:《內地雜居論》,東京:哲學書院,1889年,第10、38、49~51頁。該書封面與版權頁皆署名“井上哲次郎”,序言、緒論則署名“井上哲次郎”。

⑤ 田口卯吉:《居留地制度下內地雜居》(1893年),鼎軒田口卯吉全集刊行會編:《鼎軒田口卯吉全集》第五卷,東京:大島秀雄,1928年,第70頁。田口卯吉在文中描述了自己與井上哲次郎的論爭,闡述了井上哲次郎的觀點。

⑥ 井上哲次郎口述,澤定教、笹原貫軒筆記:《內地雜居統論》(1891年),吉野作造編:《明治文化全集第六卷:外交篇》,東京:日本評論社,1928年,第497頁。

⑦ 井上哲次郎:《內地雜居論》,第67頁。

⑧ 加藤弘之:《雜居尚早》,第36~39頁。

主义的立场欢迎中国劳工进入日本,因为外国廉价劳动力的输入可以推动日本的发展,他主张日本仿照美国走多民族移民国家的道路。<sup>①</sup>除此以外,田口卯吉的主张应该与他的日本人种起源论有关。在他看来,日本人民绝非由同一人种、同一血统构成,古代有三韩及中国的归化,近代有荷兰人、葡萄牙人遗留下的孩子。既然如此,维持人种的纯粹性本身就成为了伪命题,倒不如允许内地杂居,使日本内地人与在日本的外国人利害一致,相亲和睦。<sup>②</sup>再者,田口卯吉非常关注混血儿问题,他认为,居留地制度导致日本无法把混血儿同化,于国家不利,若是改为内地杂居,可把日本妇女与外国人之间生育的子女同化。<sup>③</sup>由此可知他对父系血统并无执念,只要父母双方有一方是日本人,其子女就是值得日本同化的对象。

第五,基于日本人与中国人在人种上的同质性而产生人种自信心,欢迎内地杂居。社会学家、教育家外山正一就是一例。1894年7月,日本与英国签订《日英通商航海条约》,内地杂居已成为指日可待之事。日本在甲午中日战争中取得胜利后,外山正一对中国人的高度肯定并未受到影响。他指出,虽然在国家间的竞争中中国不如欧美国家,但是在个人间的竞争中中国人是优胜者,无论在世界何地,欧美人在个人的自由竞争中都难以胜过中国的商人和劳动者,不得不借助法律之力排华,鉴于日本人与中国人同属“蒙古人种”,日本人必然能与欧美人展开对等的竞争。<sup>④</sup>外山正一的人种自信来源于他相信中日两国人民具有人种上的同质性,他高度评价中国移民在海外的活动,批判欧美国家的排华运动,该观点在当时较为罕见。

第六,基于人种同质性可能带来的中日合作,为避免两国人民在日本国内发生冲突,唯独排斥中国人

在日本内地杂居。例如,评论家、新闻工作者人见一太郎认为中国人吃苦耐劳、有忍辱负重之能、擅长经商,且具有强大的人口“膨胀力”,他意识到中国人已成为日本移民在海外的竞争对手,同时考虑到同属“黄色人种”的两国未来可能会携手对抗“白皙人”,为了避免中国人大举进入日本内地杂居进而与日本人产生各种竞争及冲突,他唯独反对中国人在日本内地杂居。<sup>⑤</sup>换言之,人见一太郎一方面把中国人当作竞争对手,另一方面视其为可供拉拢、利用的对象。

在有关内地杂居的相关讨论中,是否允许中国人进入日本内地杂居一直是讨论事项之一,最终反对者占据优势。<sup>⑥</sup>1899年7月,日本出台《敕令第352号》和《内务省令第42号》,虽然允许中国人在以往的居留地及杂居地以外居住、搬家、营业等,但是中国“劳动者”如果没有取得行政官厅的特别许可,不可在以往的居留地及杂居地以外居住或开展业务。具体而言,从事农业、渔业、矿业、土木建筑、制造、搬运、拉车、港口装卸及其他杂役等劳动的人员均为上述“劳动者”。<sup>⑦</sup>换言之,1899年的这项政策意味着日本实质上对中国劳工关上了大门。充满讽刺意味的是,福泽谕吉、加藤弘之等众多日本精英以美国排华运动为鉴,视中国移民如洪水猛兽,而在20世纪初,日本移民同样成为美国人的排斥对象。<sup>⑧</sup>

### 三、对外移民与人种论

1894年4月12日的《敕令第42号》(《移民保护规则》)定义道:“本规则所称‘移民’,是指以劳动为目的出国的人员。”<sup>⑨</sup>该定义本身并未规定出国的时长,事实上,日本早期劳动移民往往为了赚取高于其在日本的收入而选择在海外务工若干年,当他们赚足

① 小熊英二著,文婧译:《单一民族神话的起源:日本人自画像的系谱》,第34~35页。

② 参见田口卯吉:《经济策》,东京:经济杂志社,1882年,第233页,第238~240页。

③ 田口卯吉:《居留地制度卜内地杂居》(1893年),第65、73~74页。

④ 卯九会编:《内地杂居二对スル諸大家之意見後集》,东京:广益图书株式会社,1899年,第110~113页。

⑤ 人见一太郎:《国民の大問題》,东京:民友社,1893年,第227~230页。

⑥ 可参见稻生典太郎:《日本外交思想史論考第一——条约改正論の展開》,东京:小峯書店,1966年,第132页。

⑦ 《敕令第三百五十二号》1899年7月27日,《官報》第4822号,1899年7月28日,第1页;《内务省令第四十二号》(1899年7月28日),《官報》第4822号,1899年7月28日,第2页。可参见赵国:《新条约实施に於ける清国人の内地雑居問題について—勅令三五二号の成立時期を中心に》,《早稻田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紀要》第4分册,2014年2月。

⑧ 关于福泽谕吉的主张,参见福沢諭吉:《内地雑居の喜憂》(1884年2月20日、21日),慶應義塾編纂:《福沢諭吉全集》第9卷,东京:岩波書店,1960年,第405~408页。

⑨ 《敕令第四十二号》(1894年4月12日),外務省通商局編:《移民保護規則及施行細則》,东京:外務省通商局第二課,1894年,第1页。

一定的收入后就回国生活。本文聚焦日本明治时代，故采用该时代语境下的“移民”定义。此外，移居北海道的日本国民在当时被称为“北海道移民”，此类国境内的人口流动不被纳入本章讨论范围。

1868年，约40名日本人前往关岛，约150名日本人前往夏威夷务工。<sup>①</sup>这两支移民队伍抵达目的地后才发现工作极为辛劳、工作环境异常艰苦，其悲惨经历甚至被刊登在英文报纸上。最后经由日本政府协助，部分劳工得以返回日本。由于这些劳工是在明治元年离开日本，因此被称为“元年者”。

“元年者”事件导致日本长期停止对外输送劳动移民。19世纪80年代以后，劳动移民的输送才重新步入正轨，日本开始向夏威夷、美国本土、加拿大、东南亚、拉丁美洲等地输送以“劳动”为目的的移民。主要原因包括：日本人民生活贫困，急需寻找新出路；日本人口急剧增长，移民被视为缓解人口剧增、增加外汇收入的对策之一；资本主义的发展与第二次工业革命导致全球范围内掀起国际移民浪潮，日本同样受到这一国际大环境的影响；海外需要廉价劳动力，部分国家和地区在入种等因素的推动下愿意接收日本移民。<sup>②</sup>例如，夏威夷王国招收日本劳工固然是为了获取廉价劳动力，另有一项重要原因在于，夏威夷原住民急剧减少，卡拉卡瓦国王(David Kalākaua)等民族主义者认为夏威夷原住民所属的波利尼西亚人种与日本人在血缘和遗传背景上有亲缘关系，故而可以通过与日本人通婚来增加人口，拯救岌岌可危的原住民。<sup>③</sup>

这里主要讨论日本知识界围绕对外移民而产生的基于人种因素的观念分歧，将其分为如下几类

观点。

第一，因人种自卑感而对移居海外持悲观态度。1884年，日本赴美人数激增，逐渐填补美国排华法案带来的劳动力缺口。<sup>④</sup>尽管如此，1889年，井上哲次郎仍坚称日本人在全世界的居住生活场所唯有日本一国而已，日本人成长为强大的国民、横行世界、移居海外等并非易事。<sup>⑤</sup>这或许与井上的人口观有所关联，他吸收了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等学者的学说，认为社会越开明，出生人数就越减少。<sup>⑥</sup>按照这一逻辑，纵使日本人成长为强大的国民，也不会人口剧增至需要向海外广泛移居的地步。另一方面，从其论述中也能管窥到他自视为“劣等人种”，对该时代日本人“横行世界、移居海外”持悲观的态度。

第二，因人种自信心而主张积极向海外移民，通过选举、拓殖、同化等方式扩大势力范围。1884年，福泽谕吉把目光投向美国这片“尚未被人们完全开发”的富饶之地。他认为，日本人民“脑髓和筋骨之力不亚于欧洲各国人民，实乃上等人种”，日本国内的“壮年”既然在日本找不到工作，不妨远渡美国寻找机会，甚至可以利用美国的选举制度成为当权者，如此这般，“在广阔的世界中努力打造十个、二十个新日本国”。<sup>⑦</sup>正如东荣一郎所言，福泽谕吉是最早在日本广泛传播海外移居及殖民等新思想的知识分子，奠定了以移民为手段的民族膨胀主义的核心基础，他期待着士族出身的年轻人去美国闯荡，其笔下的日本“上等人种”并非全体日本人。<sup>⑧</sup>然而，福泽谕吉的观点过于乐观，事实上，出生在日本的日本人作为“非白人”在当时的美国难以获得归化资格，若要利用选举制度成为当权者，不如寄希望于出生在美国的日裔

① 关于“元年者”的具体人数，学界尚有争议，赴关岛务工者有40余人、42人等说法，赴夏威夷务工者有153人、149人、约150人等说法。

② 参见杜伟：《日本明治时期的海外移民潮》，《世界民族》2011年第1期；白水繁彦：《ハワイ日系人の社会史——日本人移民が残したもの》，日本移民学会编：《日本人と海外移住——移民の歴史・現状・展望》，第57~58页；坂口満宏：《アメリカ合衆国への移民》，日本移民学会编：《日本人と海外移住——移民の歴史・現状・展望》，第77页。

③ Dennis M. Ogawa, *Kodomo no tame ni = For the sake of the children: The Japanese American Experience in Hawaii* (Honolulu: The University Press of Hawaii, 1978), 5-6.

④ 参见真嶋亚有著，宋晓煜译：《“肤色”的忧郁：近代日本的人种体验》，第39页。

⑤ 井上哲次郎：《内地雜居論》，第6页。

⑥ 参见井上哲次郎：《人口ノ増殖ハ懼ルニ足ラス》，梅田君藏编：《明治大家論集：一名演説良材》，京都：法藏館，1887年，第60~63页。该文首次刊载于《东洋学艺杂志》第12号(1882年)。

⑦ 福泽谕吉：《米國は志士の棲處なり》(1884年3月25日)，慶應義塾編纂：《福泽谕吉全集》第9卷，第444页；福泽谕吉：《富貴功名は親譲りの國に限らず》(1884年7月1日)，慶應義塾編纂：《福泽谕吉全集》第9卷，第545~546页。

⑧ Eiichiro Azuma, *In Search of Our Frontier: Japanese America and Settler Colonialism in the Construction of Japan's Borderless Empire* (Oakland: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9) 32-34.

二世。

1890年,田口卯吉发表文章《南洋经略论》,主张将日本“多余”的人民送至南洋这片“丰饶之地”,通过增加商业舰队而非海军来达到促进通商、巩固国防、扩大殖民的目的。田口将移民南洋视为解决日本人口问题的方案,“多余”一词暗含着对日本底层人民的轻视。文中写道,“我日本人种闭居孤岛之内久矣”,表达了田口对于日本人不了解外部世界尤其是南洋诸岛的遗憾心境。<sup>①</sup>冈林伸夫指出,田口卯吉撰写此文是为了把自己挪用政府“土族授产金”出访南洋的行为正当化。<sup>②</sup>不过,从该文仍可读取到田口希望日本人种不再局限于“孤岛之内”,而是积极拓殖外部世界的主张。

1893年,田口从历史学的角度考察日本的人种,认为日本人种与土耳其人、匈牙利人等“同族”,无论是在技艺、学术,还是工业、农业等领域都无需畏惧雅利安人种,因此,日本人种应以积极进取的心态向世界“蔓延”,若要“在海外发扬日本人种的品味”,唯有使“独立独行的商工农”移居海外。<sup>③</sup>他指出,世界人种混合乃是天意,日本男性移民到世界各地,与当地女性生儿育女,如果就此舍弃日本的风俗语言,则于日本无益,因此需采取必要的政策,使混血儿继承并延续日本的风俗语言。<sup>④</sup>参考上文田口卯吉关于内地杂居的观点,可知田口在移民问题上专门提及男性移民生儿育女应该并非出于父权思想,而是考虑到日本男性移民数量较多的现状。时至1895年4月,也即清政府与日本谈判及缔结《马关条约》阶段,田口卯吉起草《日本人种论》,从语法、容貌骨骼、智力等方面进行分析,得出日本人种与中国人种截然不同,日本人种智力胜于中国人种,且日本人种属于“匈奴人种”,与土耳其人、匈牙利人为“同胞”的结论。<sup>⑤</sup>日本在甲午中日战争中的胜利给予田口卯吉更多的人种自信心,他已经迫不及待地要和中国人种划清界限。田口卯吉的人种起源论一直是摇摆不定的,日俄战争爆发

后,田口卯吉变“日本人种匈奴起源说”为“日本人种雅利安起源说”,不久又回到了“日本人种匈奴起源说”。<sup>⑥</sup>无论他主张何种起源说,其本质都是为了构建日本人种的自信心,积极为日本的对外政策服务。

第三,因人种同质性而产生扩张意识,主张积极向海外移民。1893年,樽井藤吉在其著作《大东合邦论》中主张,“我黄人智能不让白人”,日本国民“脑力敏捷”,虽然“躯干矮小”,不适合“劳筋力之业”,但是适合“文物精巧之事”。<sup>⑦</sup>他将视线投注到东亚、南亚、东南亚一带。《大东合邦论》主旨“在使日韩两国,为一合邦”,樽井藤吉称,当时的世界是“各人种竞争之世界”,日本是世界第五人口大国,却没有一个“属国”,而且“气候温和,故不务寒地热国之开拓”,同时又不擅长远征,日本的人种当中有来自朝鲜的成分,朝鲜的人种也混有日本的成分,两者“人种同一”,合为一国,又与“同文同种”的清国“合纵”,如此一来,不仅无需担心俄国带来的威胁,而且可以共同谋求“南洋诸岛之拓殖,使其蕃民均沾文明之雨露,然则不出数十年,而可致亚细亚黄人国之一大联邦也”。<sup>⑧</sup>樽井藤吉是主张亚洲主义的代表性政治运动家之一,其言论深受人种论的影响。他意识到日本人口的急速膨胀,同时考虑到同人种之间的亲和性,意图为日本指明一条在黄色人种国家“拓殖”的道路。在其笔下,拓殖南洋诸岛是为了向“蕃民”播撒文明的种子,这与西方帝国主义国家殖民他国的口吻颇为相似。

第四,因人种同质性而产生模仿和竞争意识,主张积极向海外移民,扩大势力范围。日本人在对外移民的过程中,往往会强烈地意识到中国移民的存在。1890年6月13日,《国民之友》第85号刊载无署名文章《日本人种的新故乡》,该文章被学界普遍认定为媒体人德富苏峰的作品。文章称,“如今已非凭借武力征服天下之时,而是凭借人种吞并世界”,中国人与英国人广泛移居海外,扩大他们在世界的势力范围,而

① 田口卯吉:《南洋经略论》(1890年3月22日),鼎軒田口卯吉全集刊行会編:《鼎軒田口卯吉全集》第四卷,東京:大島秀雄,1928年,第371~373页。

② 岡林伸夫:《人口問題と移民論:明治日本の不安と欲望》,《同志社法学》64卷8号,2013年3月,第102页。

③④ 田口卯吉:《居留地制度下内地雜居》1893年,第61、72~73页。

⑤ 参见田口卯吉:《日本人種論》,鼎軒田口卯吉全集刊行会編:《鼎軒田口卯吉全集》第二卷,東京:大島秀雄,1927年,第477~482页。

⑥ 李凯航:《明治日本的黄祸论与人种论》,《史林》2020年第2期。

⑦ 森本藤吉:《大東合邦論》,東京:森本藤吉,1893年,第42、93页。樽井藤吉,别名森本藤吉。

⑧ 森本藤吉:《大東合邦論》,第6、70、74、89、94、96~97、133、140~141页。

日本人种仅有一万余人在夏威夷务工挣钱,两千至三千元在旧金山留学。此外,海外的日本痕迹唯有日本的银元以及分布在中国香港、新加坡等地的“卖淫女”,却有四千万人口在日本国内,日本人移居外国一方面可以减缓人口增长带来的压力,另一方面则可在日本帝国外增加日本人种的势力。<sup>①</sup> 此时的德富苏峰意识到日本人种强大的繁衍能力,把中国移民视为可供参考、模仿的对象,短短四年之后,他就把中国移民视为日本移民的竞争对手。1894年6月3日,德富苏峰发表文章《日本国民的膨胀性》。此前一日,日本政府刚刚决定向朝鲜派兵,甲午中日战争处于一触即发的阶段。德富苏峰写道,日本国民正在世界各地膨胀,其大敌并非“白哲人种”,而是中国人种,中国人同样移民于世界各地,甚至比日本国民更加适应多种气候,更能随遇而安,双方都在“膨胀”,或将形成“膨胀的冲突史”。<sup>②</sup>

此外,明治时代后半期,随着日本在甲午中日战争、日俄战争中相继取得胜利,“黄祸论”甚嚣尘上。“黄祸论”给日本的对外移民蒙上了一层阴影。举例而言,20世纪初,随着移民美国的日本人迅速增多,美国西海岸开始流传黄祸论,当地人对移民的大量流入抱有警惕心理。<sup>③</sup> 日本移民在海外遭受的种族歧视也是自此愈演愈烈。日本移民与外国人之间的跨国婚姻亦随之受到越来越多的限制。<sup>④</sup> 于是,在大正、昭和时代,日本知识界围绕“黄祸论”与对外移民的交集又产生了诸多言论,此为后话。

#### 四、结 语

明治时代,国际人口流动愈发频繁,日本急需应对跨国婚姻、内地杂居、对外移民等诸多议题。随着进化论、人类学、优生学等西方科学及思想的传入,人种必然成为其中不可被忽略的元素。通过本文的分析,大致可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尽管跨国婚姻的相关法令及法律主要以“朝内的向量”增多为背景制定而成,但在“朝外的向量”增多的过程中,也有知识分子从人种视角出发,关

注到日本对外移民所带来的混血儿问题。高桥义雄基于人种自卑感,希望通过跨国婚姻实现人种改良,并得到福泽谕吉、井上馨等人不同程度的赞同;田口卯吉致力于构建日本人种的自信心,基于日本人种混合起源论,主张在内地杂居和对外移民过程中积极同化混血儿。相较而言,日本的跨国婚姻相关法令及法律明显偏重父系血统,而高桥义雄、福泽谕吉、井上馨、田口卯吉等人却不在乎与外国人结婚的日本人男是女,某种程度上具有“男女平等”的先进性。

第二,对于近代日本而言,尽管西方国家是重要的他者,但是近代日本知识界在为日本寻找人种定位时往往难以忽略中国。围绕跨国婚姻、内地杂居和对外移民等议题,日本知识界考察了日本人种当中自古以来混入的中国血统,分析了日本人种与中国人的同质性与异质性,或轻视中国人种,或对其高度肯定,或视之为利用对象、竞争对手乃至重大威胁。

第三,明治二十年前后,内地杂居与对外移民几乎同时成为热点议题,但是两项议题的相关人种论之间存在着微妙的差异,表现出不同的关注倾向。内地杂居是关系到日本本土上至达官贵人、下至平民百姓的重大事项,知识分子们关心的是日本人种如何才能在这个优胜劣汰的竞争场中存活下去。对外移民则不同。该时期的日本对外移民以务工为主,也就是说,许多处于社会中下层的日本人,特别是农民阶级怀抱着“发财梦”登上开往异国的轮船。劳动移民固然能减少日本国内的就业压力,带来丰厚的外汇收入,但是他们与知识精英们终究处于截然不同的阶层。也正因此,知识精英们不怎么关心劳动移民在海外如何与当地劳动者展开竞争,他们更在意劳动移民会给日本这个国家带来积极影响还是消极影响。于是,当“元年者”在海外受苦受难的新闻被英文报刊大肆报道时,日本政府出面协助其回国,并长期叫停移民项目;当日本劳动移民广泛分布在世界各地时,知识精英们为日本人种擅长繁衍生息而欢欣雀跃,希图

① 《日本人種の新故郷》,《国民之友》第85号,1890年6月13日,第1~3页,第6页。

② 德富猪一郎:《日本国民の膨脹性》,《大日本膨脹論》,東京:民友社,1894年,第16~17页。

③ 廣部泉:《人種戦争という寓話》,名古屋: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17年,第50页。

④ 参见ダンカン・ウィリアムズ著,辛島理人訳:《日系アメリカ人とミックスレイスの歴史,1868—1930年》,川島浩平、竹沢泰子編:《人種神話を解体する3 「血」の政治学を超えて》,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2016年,第231~232页。

日本这个国家的势力范围能伴随着劳动移民延伸出去。

日本在甲午中日战争、特别是日俄战争中取得胜利后,从弱国崛起为强国,知识分子们的人种论也随之发生变动。由于纯血与混血之争、内地杂居之争发生于甲午中日战争之前,故而单从这两项论争中难以看到人种论的巨变。尽管如此,明治维新的成就明显增强了知识分子的人种自信心,在日本正

式确立强国地位之前,日本人种起源论、膨胀论等已成为移民论的依据,德富苏峰等已开始对移民抱有开疆辟土、扩大日本影响力的期望。换言之,移民论不再停留于解决人口问题、向国外输送劳动力的阶段,而是包含着向海外输送殖民者的意味。这种以移民为名目扩张日本人种势力范围的论述,具有侵略扩张的色彩,也为日本后来的军国主义乃至战败埋下伏笔。

### **Mixed Marriage, Mixed Residence, and Emigration: Racial Theories in Japanese Intellectual Circles during the Meiji Era**

Song Xiaoyu

*(Institute of China Studies,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Shanghai 200235, China)*

**Abstract:** During the Meiji era in Japan, the Japanese had increasing opportunities to interact with foreigners. Mixed marriage, mixed residence (Naichi Zakkyo), and emigration became important issues in the intellectual circles, and racial theories are the important elements among the discussions. In addition, the racial homogeneity/heterogeneity between Japanese and Chinese became one of the focal points of the three issues in the Japanese intellectual circles. In the case of mixed marriage, some supporters expect the racial improvement effect brought about by “yellow-white mixed marriage,” on the other hand, some supporters expect the assimilation of mixed-race children in the process of mixed residence and emigration. Both sides were more advanced than Japan’s decrees and laws on mixed marriages in the sense of “gender equality.” In the case of mixed residence, intellectuals are concerned about how the Japanese race can survive in this competition of survival of the fittest. In the case of emigration, they are more concerned about where the racial characteristics can help “surplus” laborers emigrate to, which included the ambition of aggression and expansion.

**Keywords:** race; mixed marriage; mixed residence; emigration; mixed-race

[责任编辑 陈文彬]